

从“阮玲玉之死”看中国现代媒介 《玲珑》的舆论传播性别倾向

杜若松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1)

摘 要 在上海 20 世纪 30 年代最具代表的都市女性刊物《玲珑》, 因其媒介传播功能成为指导社会女性消费、趣味、风尚的指示标。而在对“阮玲玉之死”的系列报道中, 《玲珑》刊物主导性别倾向的几度变化, 印证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媒对于社会女性形象建构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与性别偏向。

关键词 《玲珑》; 阮玲玉之死; 媒介传播; 性别倾向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5) 05-0163-03

著名作家张爱玲曾说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女学生人手一本《玲珑》, 此话道出了中国现代时期女性刊物《玲珑》在社会传媒中的重要作用。《玲珑》1931 年创刊于上海, 共出版 298 期, 一直发行到 1937 年。《玲珑》的版式不仅编排小巧别致 (32 开), 还充满了都市潮流气息。娱乐是期刊主要内容, 这本身就决定了《玲珑》的“去政治化”刊物定位, “娱乐”在玲瑜所指的就是影视栏目。《玲珑》号称“全国唯一电影周刊”, 并且长期出版“幕味”周刊, 介绍、报道、评估最新电影动态。20 世纪 30 年代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发展时期, 天一、明星、联华等中国重要的电影公司都已相继建立, 围绕着电影工业出现的电影时尚、影讯八卦、明星制造、电影评论与当时丰富的都市大众文化一起构成了上海大都市纸醉金迷的最繁华景观。而作为女性刊物, 《玲珑》首先关注的就是电影给它带来的时尚效应, 借由媒体, 西方明星的言谈举止、形容相貌、服饰美容都被频繁刊登和转载, 引来了大众的追捧。对西方, 尤其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审美、文化、物质的极度艳羡和渴望, 成为《玲珑》好莱坞系列影视消息的叙述动力。

以影视八卦、秘闻黑幕的形式出现的报道稿占据《玲珑》娱乐栏目的大部分篇幅, 《玲珑》设立了“中国

电影珍闻”和“好莱坞花絮”栏目, 还有“幕味”周刊 (movie 的英文发音), 有娱乐记者专门追踪报道。男女明星的片场趣闻、绯闻逸事都是重点, 比如好莱坞的嘉宝因其知名度高而经常成为八卦秘闻的对象, 《玲珑》第 2 卷第 52 期中描写“喜修脚趾的嘉宝”, 《玲珑》第 2 卷第 64 期刊登《嘉宝行踪秘密》, 此外如南锡卡洛、伊丝托泰劳、夏克劳馥、克莱拉宝等也是谈论度颇高的外国女星。国内女星徐来、陈燕燕、胡蝶、胡珊、黎灼灼、阮玲玉等人也经常报道其新闻轶事。趣事如“联华的新明星陈燕燕, 她新近主演片时, 她的情人常侧, 听说她表演哭的时候, 她的情人也陪在旁边哭, 笑的时候也陪着笑, 于摄影场里为趣闻”。《玲珑》还乐于登载影星之间的争风吃醋、争宠得意“后旦女星胡珊, 因羨其姐胡蝶将受天一之聘, 又感久为后旦盛名不易, 遂央其姐向天一说, 将来姐妹双星有同现银幕之希望。”一些卖弄肉欲、哗众取宠的消息更是比比皆是, 1932 年《玲珑》第 2 卷第 45 期的“中国电影珍闻”栏目就写影后“胡蝶昨与闲人潘君偕至逸园舞厅腻舞”, 1935 年《玲珑》第 5 卷第 181 期以“丈夫口中徐来之性欲谭”为标题报道影星徐来, 特意另起行标注“每星期只限一次性交, 徐娘娇弱尚对付不了。”以下则详细报道影星徐来的丈夫为解释妻子并非风流而泄露的“夫妻秘闻”。一边怀疑,

收稿日期 2015-05-18

作者简介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期刊研究”(2014BS63); 长春师范大学资助项目“近现代女性期刊所展现的女性文学空间研究”(社科合字(2012)003号); 吉林省教育厅“清末民初女作家社会文化身份的现代性转型”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杜若松,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

一边乐于围观，庸众与窥探心理正迎合了这类新闻的产生。美国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在关于资本主义新闻娱乐化的判断中说“我们已经从真正的新闻转变为制造一种龌龊的‘信息娱乐’文化……通过这种提供新闻刺激的新文化，我们教导读者和观众，鸡毛蒜皮具有重大意义，耸人听闻和异想天开胜过真正的新闻。”^[1](P11-12)] 娱乐工业的发展在金钱利益的趋势下，向大众媚俗低头，以消费呈阳私为趣，从而被利用成为舆论帮凶，《玲珑》在“阮玲玉之死”事件中的多种声音正是这种性别倾向的反映指征。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是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著名影星，她的电影《野草闲花》《神女》《新女性》等一直被人奉为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经典。阮玲玉成名后陷于同张达民和唐季珊的名誉诬陷纠纷案，因不堪舆论诽谤于1935年妇女节当日服安眠药自尽，噩耗传来震惊电影界，各方唁电不可胜数，上海二十余万民众走上街头为其送葬，队伍绵延三里，鲁迅曾为此撰文《论人言可畏》。而在《玲珑》，阮玲玉从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早在1933年，阮玲玉作为《玲珑》的《幕味》周刊的封面女郎出现在首页，这时的她侧面坐在一条长凳上，流行的烫发与如画的眉目给人留下青春、典雅之感。阮玲玉的轶事出现在《玲珑》1933年3卷第17期，文章是《阮玲玉的蚊子救国》叙述阮玲玉因片场蚊子多而睡不好觉，但她说：“中国的蚊子都变成飞机，中国也就强了！”一时大家都说她发明了“蚊子救国”。1933年3卷第19期则刊登她和《小玩意》电影中的女儿“小玲”情同母女的事情。而这里边提到“阮玲玉之闻名影界，除了她那一双动人的媚眼只玩，要算她的‘独身主义’了。以前她特为了大众周知起见，登了好几天报纸的大幅广告呢。”1933年3卷第23期则有“阮玲玉的教育”一文，“最近要着手写自传的阮玲玉，据说从前曾在初中二年级读过书”。

直到1933年3卷第39期，有关阮玲玉的绯闻才突然爆出来。题目为《阮玲玉之谜》副标题是“脱离联华？嫁唐季珊？”当中编辑有这样的评论“最近影界里，实在有点不太平。真的，假的，宣传品，放空气的各式各样消息，充满了整个影界。甚至连一个明星自己，也不晓得自己在怎样办才好。”提及和张达民的关系，报道说“不过我们须知，过去她曾经正式登报宣布，否认她有跟张结合的事，她的目的是向人表示她没有跟张达民有过正式的结合。那么这次跟唐季珊，大约是正式的吧？”而到了1934年《玲珑》4卷第38期，终于出现了《阮玲玉的终生问题》并说其与唐季珊已经“伉俪结合”三年，报道还绘声绘色描绘说“唐语时现得意状，而阮亦微笑颌首不加反抗”，而不公开的原因则因“对外则绝守秘密，惟恐观众减低对阮的热烈情绪云云”。

1935年《玲珑》5卷3期，则以《影星情史：阮玲

玉的新恋与旧欢涉讼》为题，详细报道了阮玲玉、张达民、唐季珊的三角关系。

阮本为岭南产，父早故，一个老母在外国人家里充佣妇，家虽贫寒，仍设法使女入上海崇德女校读书。在阮玲玉芳龄二九的时候，认识一个中山人张达民。张本为富家子，年念余岁，醉心阮之姿态动人，时相过从，当时阮得他的青睐，是很感荣幸的。

后来阮母被雇主辞退，生活困窘异常，张达民乘机时予资助，以博取她的欢心，他们之间贫富悬殊，但以张之情意深切，阮也乐得以身相许了。不久，张母逝世，他俩因不便举行婚礼，阮遂乘机与张迁入张家，共同服孝，从此已成为实际上的夫妇。后张达民任轮船买办及税所长等职，往来于粤闽之间，独留阮于沪，业银幕生涯，这时阮的芳名已大噪，且荣誉电影皇后了。张有一个同乡名唐季珊者，现充华茶公司经理，因时往张家闲游，日久与阮熟识，且常相携出入于酒馆舞场，遂至发生恋爱。张和阮同居，本未举行婚礼，既与唐季珊关系密切，遂乘间脱离张家，开始与唐共营生活。

最近张达民任职于本埠逸达实业公司，忽旧事重提，延律师对唐季珊进行法律手续，指其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元，并私刻张氏名义之图章。唐认为所指各点，俱非事实。亦延律师控张达民虚构事实，妨碍名誉。

闻阮玲玉与张达民虽同居数载，但与民二二因感情破（劣）裂，已同意脱离，并立约为凭，证明过去只属姘居，并无婚姻关系，嗣后各图自立，不想干涉，男婚女嫁，亦各任自由等等，当时阮且登一独身主义之后事于报端，以明前此固无恋爱纠葛，以取信于唐；一说阮之后事登刊时，张尚在香港，与阮之关系，尚未断绝，见报遽返沪上，几经谈判，始定离异之据，不知究竟谁是谁非了。^[2]

此篇报道，态度虽基本秉持新闻报道立场，但从今天所知事实而言，有几个报道的倾向值得玩味。第一，本篇报道，张达民其形象与阮玲玉的遗书明显不符。描述早期阮与张之关系，报道用语为“当时阮得他的青睐，是很感荣幸的”。以此突出阮的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灰姑娘经历。而阮对张则明显是应验了“戏子无义”的说法，趁张在外地经商，与张之好友唐季珊发生暧昧，并登报脱离关系，可见其见异思迁。而“一说”的提出，更加肯定对张的支持，认为张是看见报纸才知道被阮背叛，从而给张加上了“被抛弃”者的悲惨形象。虽然在报道最后，以证据证实阮不会侵占张财产，但张达民的控告却所列甚详，这种桃色新闻，最后是“不知究竟谁是谁非”，而报道不过是将其种种“听说”与“揣测”罗列。

在今天发现的《联华画报》1935年4月1日纪念阮玲玉专号中，可见阮死前致唐季珊的绝笔说“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地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地活着呢。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那封给报馆的信则说“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以（已）害死了我啊……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100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4]

鲁迅先生说“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使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鲁迅《花边文学·论秦理斋夫人事》）这是鲁迅对当时中国社会“庸众”的麻木看客心态的批判。而联华画报刊登的采真著的《阮玲玉自杀问题之剖析》（《上海大美晚报》）说“阮玲玉之死，非自杀也；有缺陷之法律制度杀之也；炫耀之新闻记载杀之也；定命论下之恋爱问题杀之也；冷酷无情之社会杀之也。”这个“炫耀之新闻记载”当然也包括《玲珑》对于阮玲玉的不实报道。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之后的《玲珑》在1935年5卷15期又刊登了《阮玲玉生前的情书》，这封信是阮玲玉早年给张达民的信，其中充满了当时阮对张的一往情深，甚至连梦境都梦见张达民对自己不忠。可见张达民风流常态。而编者按说“今阮玲玉已矣，读此颇感张达民一中山狼也。阮玲玉真[阿必当初]。”阮死后的报道态度发生的变化并无益于新闻立场的变化，只有抛除女性偏见、新闻猎奇、利益驱使下的新闻报道，否则，还会有“阮玲玉”事件的出现。可惜的是，《玲珑》的女性声音在这场社会事件中被强烈遮蔽，女性编撰者如陈珍玲等人也只是出于“失语”状态。其后，《玲珑》还报道过“张达民演阮玲玉自杀影片：篇名‘情泪’业已全部摄竣”。其中说张“日暮穷途”“出走香港”，也算是用新闻补偿了大众“恶有恶报”的心理。

有研究者给予《玲珑》的影视文化带给女性的影响

作用进行了这样的褒扬：“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借助好莱坞明星文化发动了一场轰烈的中国女性的自我革新运动；它用好莱坞明星的力量激励中国传统女性尽快摆脱小家碧玉式的贤淑形象，一变而成为有几分男子气概的女豪杰，这无疑适应了战争年代对女子的无声号召；同时也为被束缚了千年的中国女子撕开了一个反叛传统的狭小豁口，它始终对中国女性艰难的独立生存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同情和怜爱的感怀；它将无法撼动的男尊女卑的压抑现实美化得分外狂欢；它用一种女性特有的俏皮和高傲将坚硬的事实柔化的格外令人兴奋与乐观”^[5]。这固然是对电影这个现代文明的产物给女性形象的建构新变所做出的正面的肯定，但无论是白皙的皮肤、姣好的容貌还是玲珑有致的身材，进退得体的社交礼仪，抑或是在茶余饭后议论着好莱坞影星们的轶事趣闻，这些对于女性“摩登”的意见都是《玲珑》期刊在以西方为参照、以资本主义商业全面发展的“夜上海”中树立起来的规范和标准。迈克·费瑟斯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这样评价这种示范作用“对于新商品本身的知识、这些商品的社会与文化价值的知识、以及如何恰如其分地去使用它们的知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是一种独特的情形，热衷于向上攀爬的群体对消费和生活方式的修养采取了一种学习的态度。对诸如新中产阶级、新工人阶级和新富或新上层阶级而言，消费文化的杂志、报纸、书籍、电视和无线电广播节目等，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人格转型，个人如何理财、如何搞好社会关系、如何有宏图远略，如何构建完美的生活方式等等，是极其相关的。”^[6]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场域中，女性永远摆脱不了“被看”的对象位置，而这种“被看”，也无非是满足男性的种种遐想、昭示社会欲望化的标签。

参考文献

- [1] [美] 约翰·H·麦克马那斯. 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 [M]. 张磊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 [2] 影星情史: 阮玲玉的新恋与旧欢涉讼 [J]. 玲珑, 1935 (3).
- [3] “阮玲玉纪念专号”报道其自杀全况 成为中国最早的明星专刊画报 [EB/OL]. [2013-9-14]. <http://group.mtime.com/14177/discussion/2751191/>.html.
- [4] 柳迪善. 新女性——《玲珑》中的明星文化及女性意识 [J]. 贵州大学学报, 2012 (3).
- [5] [英] 迈克·费瑟斯.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M]. 刘精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孙 藏